



《棒！少年》： 被看见与被选择的命运

曹晚红

2020年的电影市场虽不乏《我和我的家乡》、《金刚川》、《八佰》、《姜子牙》、《夺冠》这样的“爆款”，但受疫情严重影响总体艰难。元旦档到来之前，国产电影的市场表现依然不温不火。在这样的沉寂中，12月11日上档的纪录电影《棒！少年》，因其过硬的口碑而引发媒体和观众关注。在今年8月第14届FIRST青年电影展上，《棒！少年》斩获最佳纪录长片和观众选择荣誉，并因其豆瓣评分高达8.7，被认为是截至目前2020年豆瓣评分最高的国产院线电影。12月16日，刚刚落下帷幕的广州国际纪录片节，《棒！少年》获得多项提名，并最终被评为“评审团特别推荐优秀纪录片”。

这是一部聚焦一支由贫困少年组建的棒球队“强棒天使队”的体育题材纪录片。棒球，在美国和日韩相当普及，但短期内改变不了在国内属于小众运动的命运；纪录片，在热闹的影视行业中一直受众面很窄。因此，《棒！少年》上映首日排片约1%也就不足为奇了。就制片方来说，可能也并没有对票房寄予厚望。能够进入院线，能够让这群孩子的故事被看见，无论对于记录者还是被记录者而言都意义非凡。

体育题材：走向类型融合

体育题材是国产纪录片创作中的边缘题材。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后，体育纪录片数量逐渐增多，但大多集中于两类题材，一是和大型体育赛事相结合，例如《一个城市的奥运记忆》、《冰雪绽放》、《筑梦2008》等，二是围绕体育明星打造的传记类纪录片。近几年随着视频平台的进入，体育明星传记类纪录片开始出现并喷发态势，例如记录李娜退役生活的纪录片《娜就是我》2019年上线，郎平纪录片《铁榔头》已经制作完成准备在中国首映，林丹纪录片《超级丹·拼到世界尽头》等多档同类型的体育人物传记纪录片也正在紧锣密鼓地拍摄制作中。

无论是拍赛事还是拍明星，在这样的题材选择中，人被作为运动员来讲述，对其生活的真实记录也只是局限于记录其作为运动员的生活，这就使得体育纪录片局限于垂直的体育受众，缺乏对大众的情感唤起和共鸣，因而无法走向真正的大众化。

从这一点来讲，《棒！少年》突破了体育纪录片之前的题材局限，不仅聚焦于小众运动和普通人，更以其深切的社会观照和人文关怀赢得了很多连棒球规则都不懂的观众。虽然棒球少年“叫板命运”的宣发容易让人以为这是一部决战棒球场并唤起观众热血和激情的纪录片，但事实上，记录棒球少年的生活只是纪录片呈现出来的表面，观众在片中看到的更多是棒球训练和比赛之外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是前国家棒球队队长孙岭峰在自己的命运被棒球改变后而执着的公益事业，是北京——西海固（涇源）的场域对照中的真实人生。而“命运之惑”不仅仅

是这几个孩子面临的困境，更是属于

四千万留守儿童。

服务于内在叙事的需要，在《棒！少年》两小时的故事中，包含了体育、公益、成长、留守儿童等多个元素，因而表现出电影多类型元素的融合，这种融合有助于故事建构的完整性和饱满度，有助于人物塑造的立体感，并给观众超越体育和竞赛的对人性、人生和社会议题的思考。

这也吻合了当前中国电影类型的多元化和融合化趋势。近年来，中国的类型化电影呈现出类型多样、风格多元、元素融合的态势。虽然纪录片的商业化生产还在路上，但纪录片扎根中国现实，努力挖掘与观众有情感连接、与时代共鸣的故事，这样的题材选择必然突破类型的单一，而多元元素的融合才能带来更为广泛的受众和市场。

棒球少年：何处是我家

棒球是一项回家的运动。“本垒”的英文为“HOME”，进攻时打者需依次跑过一垒、二垒、三垒，最后回到本垒才能得分，所以棒球本身就是一项“回家”的运动。美国打造的棒球理念就是“家庭棒球”，父亲和孩子在后院传球，画面温馨欢快，通过打棒球实现亲子沟通。

然而，《棒！少年》中这些棒球队员们，恰恰是一群缺乏亲情因而极度渴望家的温暖的贫困孩子。剧中两位主人公都处于被母亲遗弃、父亲缺位的境遇中，尽管在漆黑的夜里，马虎大声地唱着：“妈妈呀，妈妈呀，我想你，你走了之后，我的天空就下起雨。”但他连妈妈长什么样子都一无所知。小双的父亲在他出生前就去世了，刚出生就差点被送到别人家，因被嫌弃个头太小养不活，才被双胞胎哥哥换了回来。他先跟着大伯，大伯去世后跟着姑姑，姑姑不在了才跟上二伯，现在二伯又患上了癌症。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小双，甚至连寻找妈妈的想法都没有，因为这是多么遥不可及多么奢侈的愿望，与之相比，长大后寻找自己的双胞胎哥哥甚至更现实一点。

师爷告诉他们，基地就是家，然而棒球基地这个“家”同样遭遇了无奈和困境，城中村在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着拆迁。棒球基地和宿舍、给球员上课的小学都要被拆除。

无论是打棒球，还是离开家乡来到基地，都是为了寻找一个家。他们曾经对棒球一无所知，棒球不是他们的梦想，而是未来安身立命的技艺。他们没有选择棒球，是棒球选择了他们，对他们而言，参加棒球队不是“变形记”，不是浅尝辄止的角色交换，而是只有逆风挥棒才可能改变命运建设家园的机会。片中有节奏的打桩声和远处连片的高楼下，排成一排穿着整齐棒球服走过拆迁废墟的少年，悲凉而残酷，却又有着无尽鲜活的生命力。

真实是纪录片的基本美学特征，真实是最有力度的，如同一把刀，可

能只是从微小角度切入生活，其断面却可以呈现出鲜活和丰富的社会百态，让人捧腹、让人沉思或让人泪奔。

故事化叙事：反差与对照

冲突与反差通常被认为是故事片必需的，纪录片就是对生活的原生态记录。然而纪录片同样是选择的艺术，《棒！少年》的叙事顺应了素材天然赋予的故事化特征，在时间的流动中自然地呈现出一系列的反差和对照。

性格决定命运，双主人公的选择强化了马虎和小双的性格反差带来的人生态度的鲜明对比。如同野草般生长的马虎浑身都是戏，翻跟头、打架、调皮捣蛋，自己就走到镜头里了；缺乏安全感的小双是沉默的，留给观众的是被教练批评时强忍的眼泪、美国赛场上无助的眼神和村头大树下徘徊的身影。然而他们毕竟只是十一二岁的孩子，还在应该无忧无虑需要呵护的年龄，想当老大的马虎也有夜里不敢一个人睡觉去找教练的时候，小双偶尔也会在喧闹中对好朋友倾诉心声。素材的丰富使得两人的性格呈现并不是单向度的对比，而更为丰满。

两人的两处交集既体现出时间的魅力，又再次形成对比。第一次，马虎魅力乍到，因对小双的语言伤害而打架；第二次，马虎已经融入球队，赛场失利后马虎用衣袖给小双擦去眼泪。面对失利，两个少年表现出迥异的人生态度，马虎认为以后机会多得是，小双哭着喊出“就这一次机会，没了！”没有谁是谁非，从打架到擦泪，看得到两人的成长，然而成长的过程如此艰辛。在这个过程中，从棒球队创办人孙教练到师爷张教练、郭教练，一天天地看着，一棒棒地教着，那种耐心、付出和绝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的信念，甚至胜过一些父母者。

生活不是传奇，生活是一地鸡毛。没有一蹴而就，只有在泪与笑中慢慢长大。孩子们流过很多次泪，马虎回家探亲离开时的泪，得知基地要被拆时的泪，输了比赛小双崩溃的泪，放弃归队后教练开车离开后的泪……片尾，站在村口枝繁叶茂如同母亲般温暖的大树下，一向郁郁寡欢的小双脸上露出难得的孩子的笑容，望着身患癌症低头坐着的二伯，那一句“你不能丢下我不管！”，成为观众最大的泪点。

记录已经结束，生活还在继续。队长大宝个头已经一米八三，马虎变得彬彬有礼，小双回归球队……观众心心念念的孩子们迅速成长着，同样成长着的还有“强棒天使队”这支队伍，不仅从最初的十多个球员增加到六十八名，还有了U10年龄组的女子棒球队。虽然依旧是微光，但总归照亮了更多贫困儿童的人生旅程。

被看见，被选择，将带来更多的改变。这也是记录的力量。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教授）

《气球》： 在摇晃的缝隙中升起的“气球”

李清

影史上有很多关于气球的电影，最著名的莫过于法国导演艾伯特·拉摩里斯1956年的《红气球》，片中由他儿子扮演的小主人公和路上偶遇的红气球结成伙伴，游荡在巴黎的大街小巷。红色的气球在电影中具有了生命，梦幻飘忽，美好似童年，热烈如爱情。影片最后拉摩里斯把全巴黎的气球聚集一起放飞，像烟花一样开满天空。《苏格兰影评人》评论说，“电影人在经历过那一刻的红气球后，谁还敢再在银幕上表现红色的气球？或者，谁又敢表现气球不是红色的？”然而，最近在院线上映的藏族导演万玛才旦的电影《气球》，最开始进入我们视野的，却偏偏是白色的气球。当然，那不是真正的气球，那是被孩子当做气球玩耍的避孕套。

万玛才旦的《气球》是我看过的最不以猎奇吸引眼球、最没有刻意标签化表达的藏地题材电影，藏区的日常生活和文化都自然融入故事中，表现的还是普世的人性。影片的背景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正处于工业文明蓬勃发展时期，这股风潮同样也渗透到偏远的藏地牧区。现代文明带来的不仅是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冲击着传统的思想观念。而影片讲述的就是牧民达杰一家，面临现代文明与传统观念两个观念碰撞时的两难处境。

电影中达杰一家是藏地典型的牧民人家，算起来有七口人。妻子卓嘎操持家务，大儿子江洋在县城寄宿读中学，每天虔诚握着佛珠念六字真言的老父亲帮他在草原上看守羊群，两个儿子尚年幼，还有卓嘎的妹妹阿尼在寺院当了尼姑。

电影以“红白气球”贯穿全部的情节。“白气球”（避孕套）在影片的开篇就出现了。草原上，达杰的两个小儿子将避孕套吹成气球，在明晃晃的天空下嬉戏玩耍，骑着摩托来给父亲送饭的达杰看到了，又尴尬又气恼，一把夺过来戳破，嘴里嘟囔着“怪不得昨晚找不到”。而他的老父亲却浑然不知，问他为什么要毁了孩子的玩具？达杰只好承诺要去镇上给两个儿子买气球。

经历过计划生育国策的国人，对这种情景并不陌生。“白气球”在影片中是重要道具，它既顺理成章勾连出最后真正的红气球，又是故事发展的功能性元素，决定着情节的重要走向，如果这影片换成另一个片名，也可以叫《一只避孕套引发的事故》。“白气球”还是卓嘎焦灼情绪的诱发点，她很担心再次怀孕，一方面是生育和养育的艰难，另一方面，按照国家节育政策，再添孩子他们还要面临罚款，是一个无法承受的负担。但丈夫旺盛的性欲，让家里总是“白气球”匮乏，政府又是按期发放，她从女医生措措那里拿到了最后一只，但还是被小儿子偷拿去和邻居小孩交换了哨子，导致她后来的意外怀孕。饶有趣味的是，被孩

子当做“气球”光天化日下开心玩耍的避孕套，却是成年人的禁忌，人人都耻于出口。尼姑妹妹阿尼在姐姐家找书时，不小心翻了出来，问这是什么东西，当卓嘎附耳告诉她后，她立马像烫手一样扔到床上。片中有一个情节，邻居孩子的父亲怒不可遏地来找达杰算账，他哆嗦地指着手里的白气球说，你儿子居然拿这种东西和我儿子换了哨子！达杰也感到理亏，却不肯示弱，于是两个成年人“为这种东西”打了一架。

作为现代人对生殖繁衍的阻隔工具，“白气球”也可以视作现代文明的指代，它象征着规范和秩序。而它反面延伸的则是：繁衍、生命、转世。这正是影片要表现的主题，也就是处于现代文明和传统文化夹缝中的藏地牧民，该如何应对现实和信仰拉扯的困境。

影片主要围绕达杰一家日常生活展开情节，细节饱满生动，但又十分自然，像达杰家附近绵延的沙漠，像远处起伏的山峦，像草原上空慢慢流动的云朵，藏区鲜为人知的生活，一一呈现。影片没有刻意安排的戏剧冲突，但每一处都不是闲笔，甚至每个对话都有所暗示，充满了对应和隐喻，有着很强的张力。比如影片中一家七口人围坐吃晚饭，电视里正在报道国外试管婴儿成功的消息，爷爷看不懂，经大孙子解释后，他斥之为“魔鬼”，马上让关了电视。而在让两个小儿子为他搓背时，他自然的提到大孙子江洋背上有一个痣，和去世的奶奶长的位置一样，所以他认为江洋其实是奶奶转世。他一再强调转世回到自己家，是非常大的福份。这些看似不经意的细节，都为后面这个家庭将要面临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电影有很大的篇幅铺排繁衍的主题。对于达杰两口人来说，他们赖以生存的羊群需要大量的繁衍，但已经有三个儿子的家庭则需要节育。羊和人形成了对应关系。达杰每年都要去朋友那借种羊和他们家母羊配种，他看着雄性十足的种羊忍不住和卓嘎赞叹，卓嘎情羞挪揄，“和你一样”。白天种羊在羊群中威猛地追逐交配，晚上达杰在床上性欲汹涌，然而这个场面并不香艳，没有构成对观众激情的调动或者潜在的偷窥欲望，因为避孕套缺失的多次铺垫，观众和卓嘎一样的焦灼。

如果说种羊和达杰形成对应关系，那么另一只两年不产崽的母羊则是对卓嘎的隐喻。达杰在羊群中拽出这只母羊，让卓嘎将它单独拴起来喂肥，以便卖了换钱给大儿子交学费。卓嘎说，“这只羊很老实”，达杰鄙夷，“老实有什么用，它又不产崽”。母羊日益肥大，卓嘎每次看着它都心有戚戚。后来公公去世，卓嘎不久查出怀孕，按照藏地的转世文化信仰，她成了公公转世的重要一环，

她的命运和这只拴牢的母羊一样，中断孕育则要受到来自宗教和家庭的惩罚。

卓嘎的困境令人想起伊朗著名的电影《一次别离》，同样是现实和宗教的冲突，女主也同样陷入两难困境，但万玛才旦没有像阿斯哈·法哈算那样，对这个困境做更深层次铺展和剖析。对于因为决定流产被达杰打了一耳光，在手术床上被阻止的卓嘎，最后到底有没有留下胎儿，他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他让不堪承受生命转世和亲人情感羁绊之重的卓嘎，转身随妹妹阿尼去了寺院，留给丈夫和孩子一个悲伤的背影，那条一直围在她脖子上，有时包在她头上的淡蓝色围巾，如一抹眼泪消散在她离家的路上。万玛才旦说，卓嘎的困境也是他的困境，他没法替卓嘎做出选择。

确实，万玛才旦作为藏地导演，他的价值观和美学体系都不可能完全脱离自己的民族身份和内在审美，他影片中塑造的如达杰、卓嘎这样的人物，在现代文明和宗教信仰的碰撞交汇中是个极大的矛盾体，有接受现代文明的一面，也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印记。这其实也是万玛才旦个人的迷思。对现代文明的认同和对哺育他成长的民族文化信仰的浓厚情感，使他的作品产生了裂缝，在这裂缝中我们窥视到了他轻微的摇晃，一如《气球》中使用的手持摄影机拍出的摇晃画面，还有电影中语焉不详的魔幻梦境。比如爷爷讲到孙子江洋是奶奶转世后，影片出现了一场魔幻梦境，两个幼小的孙子剥离下哥哥江洋背上硕大的转世印记的黑痣，光着身子在蒸腾的沙漠上奔跑，令人心生不安恍惚。如果这个梦境显得意味含混暧昧，那么在爷爷突然离世后，江洋的梦则将万玛才旦内心对转世信仰的敬畏揭示无遗：在江洋“爷爷、爷爷”的声声呼唤中，满天绚丽的彩霞漫卷在蓝色的湖水中，爷爷乘着小船穿越云海的倒影赫然出现，笔直地向着彼岸度去，不知是告别还是轮回。这个画面庄严神圣，不容悲伤，只有震撼。

创作者在作品中的摇晃，让语义显得没有那么的明晰和直白，给观者留下许多解读的空间，也许恰恰是作品的魅力所在。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人生本来也说不清道不明，这其实也正是生命值得一再探索的题中之义吧。

影片的最后达杰终于从镇上买来两只艳丽的红气球。两个儿子一人一只欢呼雀跃地在沙漠中奔跑，一只瞬间爆炸，一如残缺的人生，而另一只则飞上了天空。片中所有的人都抬头仰望。气球带着迷思，带着希冀，如无法割舍的欲望，也如无奈的叹息，在苍茫的清空中渐渐远去。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研究员）

